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 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 译介学导论

谢天振◎著

译介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如果要对它作一个简明扼要的界定的话，那么不妨说，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的，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译介学导论

谢天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介学导论/谢天振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0

(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1-12845-9

I. 译… II. 谢… III. 文学—翻译理论—高等学校—教材
IV. 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9009号

书 名: 译介学导论

著作责任者: 谢天振 著

责任编辑: 兰 婷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2845-9/H·185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4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zbing@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18.25印张 350千字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出版总序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是教育部于1985年批准建立的我国高等学校中第一个从事比较文学学术研究和培养相应学术人才的实体性研究机构。就人才培养而言,在近20年的时间里,建立起了培养硕士、培养博士和博士后流动站作业的比较完善的学术教育系统,同时也形成了接纳来自国外的高级研究员,以及来自国内兄弟院校进修教师的有效机制。

比较文学繁重和复杂的学科教学,迫切需要一套相应的教材和读本。这套教材和读本,既要能够表述本学科基本学术内涵,又要能够表现学科研究中所取得的相对合理和稳定的公共成果;既要能够阐述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学科真理性和前瞻性的见解,又要能够表述作为中国学者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理论体验和文本解析特征。这套新教材的根本宗旨,应该在于使中国人明白到底什么是“比较文学”,并且使对这一学科有兴趣的中国人懂得到底应该怎样做“比较文学研究”。

目前,比较文学的教学基本上是靠译介国外的学科著作作为学科教材和读本。国内流行的由学者们撰著的(包括我们参与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原理”和“比较文学概论”,乃至“高等原理”等等,起到了“启蒙”和“救急”的作用,但由于基本内容都是关于国外对这一学科学理的阐述,几乎没有中国文化和文学文本参与其间,也没有作为学者本身参与实践的体验,虽然给了读者不少的知识,但读者却常常觉得对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难以把握。不少有兴趣的研究者也仍然徘徊在学科的门前,不得登门入室之道。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贬损25年来我们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努力和这一学科发展的事实,也没有贬损“译介”国外学科著作的价值和意义。当我们在获得充分的历史感

的基础上,作为一个担负着十分沉重的比较文学学科教育责任的研究所,点检我们学科教材与读本的建设,我们深感应该集合学科诸位同仁的力量,改变在这一学科的基本理论层面上四分之一世纪中以国外著作为主,以本国学者阐述其著作作为辅的学术尴尬状态,重新编撰一套我们深切期望的具有上述四个特征的比较文学学科教材。希望这套教材能够提升学科人才培养质量,并引导更多对比较文学有兴趣的青年能够较快地走进学术之门。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总结自己 20 年来在培养硕士和博士教学和在博士后流动站作业中,以及国内外研究者的研修中积累的学术知识和学术体验,综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并约请相关的同仁,共同着手编著“21 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依照目前的规划,参与这套教材第一期的作品有乐黛云等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乐黛云的《比较文学简明教程》、严绍疆的《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论导论》与《比较文学发生学导论》、孟华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导论》、车槿山的《比较文学叙事学导论》、刘东的《比较美学导论》、陈跃红的《比较诗学导论》、张辉的《比较文学阐释学导论》、谢天振的《比较文学译介学导论》、张哲俊的《东亚比较文学导论》等。

我们希望这套教材能够把比较文学的学科注意力,在一般概念阐述的基础上引向更加深入的学科的各个研究层面,展现学科各个内在领域的内奥与各自的特征,并力图使读者在理解学科的总体学术框架的同时,在比较文学的众多研究层面中体验学术的实践要领。

这套教材之所以用“21 世纪”冠名,是为了体现它的“开放性”和“长期后续性”的特征。此即这套教材由我们现在开头,它将在整个 21 世纪不断得到补充和更新,有更加丰富的学科教材参与其间。大部分作品定名为“导论”,意思是表示本教材仅起着“导航”的作用,它不可能穷尽比较文学所有的理论和所有的研究层面;它试图承担起“领航员”的作用,而船舶入港的速度,靠位的准确与否,则在于船舶驾驶员的能力和船舶本身的结构与性能了。

参与这套教材的各位编著者,都是在我国比较文学学科中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并且长期指导着本学科各类研究生的学术实践者。他们

的业绩为我国比较文学界普遍地知晓,更有数位是在国际比较文学界有一定地位的学者。他们以自己的睿智综合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阐述自己在学术实践中的体验,条分缕析,辨证考核,注重实践,谢绝玄虚,期望以自己的学术心得有益于把我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推向切实的研究层面。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作为目前担任的本教材的主编,多少可以自豪地说,“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的每一部作品,其实也是每一位先生在一个专门的领域中的一部专门著作。它既为比较文学学科的研究生提供了基本的教材,也为在我国各类学校中未经受过严格的比较文学学术规范训练而正在从事着这一学科教学的同行,而且也为在更加宽阔的层面上喜爱比较文学的读者们,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们,提供了一套由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学科读本。假如各位读者能够在本教材系列中得到程度不等的学术教益,受到学术启示,并因此而多少有助于各位的学术事业,那就是对本教材编者们的最大的慰藉了。

我们也诚恳地期待在阅读本教材过程中各位读者的批评指正和商榷感想。

这一套教材是北京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一个部分。

本研究所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承担本教材系列的出版,感谢外语编辑部张冰主任与各位编辑的辛勤劳作。

严绍璩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主编

(2004年立春之日撰于北京大学静园六院)

目 录

绪 论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翻译研究	(1)
第一章	翻译研究的文学传统和当代译学的文化转向 ——译介学诞生的历史背景	(17)
第二章	译学观念的现代化与国内译学界认识上的误区 ——译介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48)
第三章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69)
第四章	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 ——译介学研究实践层面之一	(96)
第五章	翻译文学的性质与归属 ——译介学研究实践层面之二	(123)
第六章	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 ——译介学研究实践层面之三	(151)
第七章	解释学与翻译研究 ——译介学研究理论前景之一	(167)
第八章	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 ——译介学研究理论前景之二	(182)
第九章	多元系统论与翻译研究 ——译介学研究理论前景之三	(200)
第十章	无比广阔的研究前景 ——译介学研究举隅	(216)
附 录	译介学研究推荐书目	(274)
后 记	(279)

绪论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翻译研究

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我国学界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紧密的,直至 90 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情况才慢慢开始有所改变。而在此之前,在一些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和教师看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是文学,是对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或关系研究,而翻译研究关注的则是不同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两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并不相干。即使在一些比较文学著作或教材中也提到翻译,但多是把翻译作为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一个关注对象而已,并不意识到翻译研究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比较文学的认识有失偏颇,他们往往把比较文学理解为单纯的文学的比较,而并不了解比较文学包含着许多研究分支领域,诸如文类学、主题学、形象学、比较诗学,等等,而翻译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被称为译介学,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也不是很清楚,他们不知道目前国际译学界的翻译研究已经越出了从前那种单纯的语言文字的技术性转换层面的研究,而已经进入到了文化层面上对翻译的全方位分析、审视和探究。就在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正当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之时,国际译学界出现了西方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性重大转折:翻译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西方译学专家们借鉴、运用形形色色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切入,从而使得翻译研究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文字转换的研究,而是还具备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性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摆脱了对应用语言学的从属地位,取得了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

位：在世界几十个国家两百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独立的翻译系或学科。

其实，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国际翻译家联合会(FIT)倒是有很清醒的认识：早在1977年5月，国际译联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会议期间就曾经通过了一项特别的决议，鼓励一些比较文学专业(program)把翻译的艺术和理论正式作为它们课程的一部分。国际译联本来是一个以技术翻译为基本方向的国际组织，然而像这样一个组织竟然也通过了上述这样一个决议，这首先当然是表明了它对文学翻译和比较文学的重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从中窥见翻译与比较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的许多大学里都设有以“比较文学与翻译”命名的系或专业，有的学校虽然单独命名为“比较文学系”，但在比较文学系里必定开设翻译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讲授翻译理论)。此外，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也历来把翻译视作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它的机构中不但有一个常设的翻译委员会，而且每次会议都把翻译作为主要的议题之一加以讨论。具体而言，自1967年第5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贝尔格莱德)起，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每一次年会都把翻译列入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加以讨论。在1976年的第8届年会(布达佩斯)上，会议组织者不但把翻译研究作为专题讨论的内容之一，而且还成立了一个常设的翻译委员会^①。1988年第12届年会(慕尼黑)上，年会的三个大会主题发言之一就是翻译研究问题——“翻译研究中的‘历史’与‘体系’”，而在2000年第16届年会(比勒陀利亚)上的一个专题讨论也是“译本和译者创造的新语境”。在2004年举行的第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香港)上，同样有多场翻译研究的专题讨论会，不光有研讨翻译问题的工作坊(workshop)，还有翻译研究专题的圆桌会议。如果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们还是较多强调借助语言学理论来研究翻译的话，那么，从70年代起他们已经开始重

^① 该翻译委员会由东西方各国共6名翻译专家组成，本书作者于2000年第16届年会(比勒陀利亚)、2004年第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中国香港)上，与日本、韩国两名学者一起，作为东方国家的代表，连续两届当选为翻译委员会委员。

视结合文学翻译的特点来研究翻译了^①，而进入七八十年代以后，则如前所说，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把翻译提升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一种受译入国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等因素操控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予以分析、进行了研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比较文学可以说起了相当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像对当前国际译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埃文·佐哈尔、吉迪恩·图里、苏珊·巴斯奈特、安德鲁·勒菲弗尔等人，他们不光是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而且也都是当代世界著名的比较文学家。

比较文学学者之所以高度重视翻译研究，这与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它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文学关系。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要发生关系——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其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打破相互之间的语言壁垒，其中翻译毫无疑问起着首屈一指的作用，翻译也因此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最为关注的一个研究对象。

其实，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当能发现，译介学的研究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比较文学家们对翻译的关注就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翻译文本了。1931年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在其专著《比较文学论》的第七章“媒介”里就提出，对译本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把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研究，以“确定译者有没有删去几节、几页、几章或者有没有杜撰一些什么进去”，以“看出译本所给予的原文之思想和作风的面目，是逼真到什么程度，……他所给予的(故意的或非故意的)作者的印象是什么”；另一个是把同一作品的几个不同译本之间的比较，以“逐时代地研究趣味之变化，以及同一位作家对于各时代所发生的印象之不同”。关于译者，他认为可以研究“他们的传记，他们的文学生活，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媒介者的任务”等。此外，梵·第根认为，译

^① 这里指的是从理论层面上对文学翻译进行的研究。众所周知，文学翻译研究在西方古已有之，但上升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层面却是20世纪后半叶以后的事。

者的序文也很有研究价值,因为它们会告诉我们许多“关于每个译者的个人思想以及他所采用(或自以为采用)的翻译体系”等“最可宝贵的材料”。^①

继梵·第根之后,1951年,另一位法国比较文学家基亚(Marius-Francois Guyard)在其所著的《比较文学》专著中以大量的例子说明,“长期以来,我们对译者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他认为在这方面有许多“心理的”、“历史的工作”可做。^②

比较文学家还从一个新的角度去阐述翻译和翻译研究。意大利比较文学家梅雷加利(Franco Merregalli)指出:“翻译不仅是不同语种文学交流中头等重要的现象,并且也是一般人类生活和历史中头等重要的现象。虽然翻译的最终结果大概是属于语言,而后再属于终点文学(指译入语文学——引者)范畴的,可是翻译行为的本质是语际性。它是自然语言所形成的各个人类岛屿之间的桥梁,是自然语言非常特殊的研究对象,并且还应当是比较文学的优先研究对象。”^③法国比较文学家布吕奈尔(P. Brunel)等三人在他们合著的《什么是比较文学》一书也提出:“对一种翻译的研究,尤其属于接受文学的历史”,“和其他艺术一样,文学首先‘翻译’现实、生活、自然,然后是公众对它无休止地‘翻译’。所以,在无数的变动作品和读者间的距离的方式中,比较文学更喜欢对翻译这一种方式进行研究。”他们还明确提出,“比较学者的任务在于指出,翻译不仅仅是表面上使读者的数量增加,而且还是发明创造的学校”。^④

斯洛伐克比较文学家朱里申(Dioniz Durisin)的论述同样把翻译看作文学接受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他以俄罗斯文学中克雷洛夫翻译法国作家拉封丹的寓言和茹科夫斯基翻译德国诗人毕尔格的叙事诗《莱诺勒》为例,说明翻译是如何深深地影响了接受国文学的:

① 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 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6、20页。

③ 梅雷加利:《论文学接受》,《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409页。

④ 布吕奈尔等:《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0、216、223页。



克、茹两氏的翻译由于译者的太多的再创造,已使得译作与创作融为一体,然后又通过这种似译作非译作、似创作非创作的文学变体,影响了接受国的文学。^①

罗马尼亚比较文学家迪马(Al. Dima)则对译序和译者的前言等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认为它们“包含着译者对原作的评价、对作者的介绍”,“连同译作一起都是促进文学联系的一个因素,也是历史比较研究的一个材料来源”。^②

至于上世纪90年代初英国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研究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她刚刚出版的专著《比较文学》一书的第七章也是最后一章“从比较文学到翻译学”中,更是相当深入地考察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并认为,原本作为比较文学一个分支的翻译研究,从70年代末以来已经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了,“当人们对比较文学是否可视作一门独立的学科继续争论不休之际,翻译学却断然宣称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这个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所表现出来的势头和活力也证实了这一结论”。^③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翻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以语言转换为对象的翻译研究,而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视野中的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

说起来,国内学者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也不是一无所知。上世纪80年代初张隆溪在《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一文中就已经提到:“钱先生在谈到翻译问题时,认为我们不仅应当重视翻译,努力提高译文质量,而且应当注意研究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就目前情况看来,我们对翻译重视还不够,高质量的译文并不很多,翻译理论的探讨也还不够深入,这种种方面的问题,也许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会有助于逐步解决。”^④由此可见,钱先生也早已把深入探讨翻译理论的希望寄托在我国比较文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上。

① 朱里申:《文学比较研究理论》,俄文版,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9年,第159—172页。

② 《比较文学引论》,谢天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141—142页。

③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3, pp. 160—161.

④ 张隆溪:《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载《读书》1981年第10期。



不过,不无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比较文学学者对翻译所作的研究,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从比较文学的立场出发所进行的翻译研究,也即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译介学研究,与相当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并不完全一样,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

一般说来,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这样三类:

第一类属翻译技巧与翻译艺术范畴,旨在探讨对出发语(外语)的理解与表达,如对英语中某些特殊句型如何理解、如何译成中文的讨论,或是研究翻译的修辞艺术,诸如外译中时长句的处理,某些外语结构的汉译分析,等等;

第二类属翻译理论范畴,多结合现代语言学、交际学、符号学等各种理论,或结合民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翻译现象作理论性的阐发,或从理论上进行归纳和提高,总结出能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如等值论、等效翻译论,等等;

第三类属翻译史范畴。这一类研究除了对翻译活动和翻译事件的历时描述外,还有大量的对翻译家、文学社团、翻译流派的翻译主张、成就得失的探讨,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的比较、钩沉、溯源,等等。

不难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尤其是第一、第二类研究),其实质更多的是一种语言层面上的研究。

而从比较文学立场出发的翻译研究,也即我们这里所说的译介学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因为它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把翻译文本作为一个既成的历史事实进行研究,把翻译过程以及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而不是外语教学研究的对象加以审视和考察。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也即译介学研究就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和对翻译实践操作的规定、指导,从而更富美学成分。当然,与此相应的是,它也就缺乏对外语教学和具体翻译实践层面上的直接指导意义。曾经有一位语言学家这样问我,他说:“读了你的《译介学》,读者的翻译水平会不会得到提高?”这位语言学家显然并不了解译介学研究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而把译介学研究

与传统意义上的规定性翻译研究混为一谈了。其实,就像我们读了这位语言学家的语言学著作我们的讲话水平不见得就会得到提高一样,译介学研究的目的是不在于指导读者具体的翻译技巧,尽管在某种意义上它也会有益于读者的翻译水平提高,但这是另一回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译介学与语言学其实倒不无相通之处,即它们都是一种纯理论的研究,都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它们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它们所研究的对象,揭示这些对象的性质;但它们不是应用性研究,帮助读者如何更好地进行翻译实践操作并不是它们的目的。

明乎此,我们再去看比较文学对翻译的研究就可以比较明白了:比较文学是从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上去理解翻译、阐释翻译,并给翻译注入了空前丰富的内涵。譬如把文学作品创作过程的本身也视作是一种翻译,即作家对现实、对生活、对自然的“翻译”。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一部文学作品一旦问世,它就开始接受读者对它的形形式式的、无休无止的“翻译”——各种读者的不同理解、接受和阐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译者对另一民族或国家的文学作品的翻译就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它还是译者对反映在作品里的另一民族、另一国家的现实生活和自然的翻译(理解、接受和阐释),翻译研究也因此具有了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的性质。譬如比较文学学者对误译的研究、对庞德英译唐诗的研究,等等,就是这样性质的研究。庞德的英译唐诗充满误译,许多句子的“英文文法都不通”,对一般的外语教学和翻译实践显然不足为训,但庞德的英译唐诗却引发了20世纪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具有明显的文学史上的意义。比较文学学者对它的研究正是揭示这方面的意义。事实上,把翻译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也正是当代西方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趋势,美国《今日世界文学》季刊1978年春季号就刊登了一篇谈西方文学翻译的文章《西方的文学翻译:一场争取承认的斗争》,作者赖纳·许尔特(Rainer Schulte)就呼吁:“从创作观点和学术观点两方面看来,现在是把翻译看作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的时候了。”^①

^① 《西方的文学翻译》,载《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第114页。

至此,我们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比较文学为我们看待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展现了一个新的、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这个领域就是——译介学。

那么,什么是译介学呢?对比较文学圈外的学界来说,译介学应该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术语,人们往往把它和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混同起来,像前面提到的那位语言学家一样,以为译介学也是研究什么翻译技巧或是什么翻译理论,甚至把它与训练和提高人们的翻译水平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一个误解。因此,要为译介学下一个定义的话,首先有必要先把它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区别开来。两者的区别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研究角度的不同。比较文学学者研究翻译多把其研究对象(译者、译品或翻译行为)置于两个或几个不同民族、文化或社会的巨大背景下,审视和阐发这些不同民族、文化和社会是如何地进行交流的。例如钟玲对寒山诗在日、美两国的翻译与流传的研究,研究者并不关心寒山诗的日译本和英译本的翻译水平、忠实程度,她感兴趣的是,在中国本土默默无闻的寒山诗何以在译成了日文和英文后会在日本长期广为流传、大受尊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同样大行其道,不仅成为那“垮掉的一代”青年人的精神食粮,而且还形成了连李白、杜甫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寒山热”。由此她详细考察了美国社会盛行的学禅之风以及风靡一时的嬉皮士运动与寒山诗在美国流传的关系。^①

其次,是研究重点的不同。如所周知,传统翻译研究多注重于语言的转换过程,以及与之有关的理论问题,因此翻译的方法、技巧、标准等,诸如“直译”和“意译”、“归化”和“异化”、“信达雅”等一直是传统翻译研究的中心话题。而比较文学研究者关心的是不同民族语言的转换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两种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它们的相互理解和交融,相互误解和排斥,以及相互误释而导致的文化扭曲与变形,等等。一般说来,比较文学研究者不会涉及这些现象的传统翻译研究意

^① 钟玲:《寒山诗的流传》,载《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

义上的价值判断问题。

当然,有时候在这种研究中,比较文学研究者同样也会触及到翻译的忠实与否、表达是否确切等问题并对之作出评判,如奚密的《寒山译诗与“敲打集”》,研究者把译诗与原诗进行了对照,以求证译者的忠实程度,但这些分析并不是研究者的重点,她的重点在于揭示寒山译诗与译者本人的诗歌创作在题材、思想、意义等方面的相通之处——英译者史耐德(Gary Snyder)在翻译出版了译诗《寒山诗集》一年后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个人诗集《敲打集》,因此寒山诗的翻译对他个人的诗歌创作具有很明显的影响。^①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研究目的的不同:传统翻译研究者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总结和指导翻译实践,而比较文学研究者则把翻译看作是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的一个对象,他把任何一个翻译行为的结果(也即译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其对影响、接受、传播等文学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的考察和分析。这样,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相对说来就比较超脱,视野也更为开阔,同时更富审美成分。

例如,比较文学学者可以对跨文化交流中的缺乏对应词现象进行研究,从而具体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譬如汉语中丰富的烹饪词汇,如“炒、炸、滑、溜、扒、焖、煎、煮、炖”等,常常使汉译外工作者感到穷于应付,但英语、俄语中大量的表示“胡子”的词汇,法语中大量的关于“酒”的词汇,阿拉伯语中数以百计的描写骆驼及其各部分的词汇,爱斯基摩语中不可胜数的关于“雪”的词汇,同样使外译汉工作者感到汉语在这方面词汇的匮乏。而当我们遇到像 trespass 这样的词时,我们不能不感到更深的为难了,我们虽然可以把它译为“侵入”,但远未传达出该词的真正涵义。因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举例说,两家紧挨着的邻居,屋后的场地仅隔着一排高不及腰的栅栏,一旦有东西掉入对方场地,当即越过栅栏去把它捡回来是很寻常的事,决不会想到他的这种不经过主人许可就擅自进入邻居场地的行为已经构成了

^① 载郑树森编:《中美文学姻缘》,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



trespass。Trespass 一词背后所蕴含的西方人对私有空间的尊重,对多数中国人(由于居住空间比较狭小,相互关系比较亲密,不分彼此)来说恐怕很难想象。由此可见,缺乏对应词现象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不同民族在地理环境、生产、气候等方面的差异,它还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在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道德价值等方面的差异。

在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原文文化信息在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增添、失落和变形也是译介学研究者非常关注的一个现象。例如,在许多语言中都有以动物喻人的比喻。在多数情况下,由于人类对动物特性的认识有共通之处,所以这些比喻在翻译时不会引起接受者的误会。如汉语中说某人是一条蛇、一条狼、一只虎,译成外语后人们马上就能理解其真正的涵义。同样,英语 He is a fox,译成中文“他是一只狐狸”,中文读者也能领会其中“喻某人狡猾”的含义。但是当我们把 She is a cat 译成中文“她是一只猫”时,有多少中文读者能体会到原文暗喻某女人“居心叵测、包藏祸心”的意思呢?而当我们把 You are a lucky dog(直译“你是一条幸运的狗”)译成中文时,中文读者很可能会拂然变色,甚至勃然大怒,因为他不知道在有些英语字句中的“狗”并无贬义。

从以上我们对译介学研究与传统翻译研究所做的区分中我们不难发现,译介学研究跳出了单纯语言层面和文本层面的研究,而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层面。所以我在拙著《译介学》曾对译介学的定义进行了如下一个简单的描述:

译介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如果要对它作一个简明扼要的界定的话,那么不妨说,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严格而言,译介学的研究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译介